



第七辑



玉溪市志資料选刊

玉溪市志资料选刊

第七辑

玉溪方言志

张 莉 编著

玉溪市地方志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四月

序

《玉溪方言志》刊印了，我祝贺它的诞生。

这可能是我省第一部铅印的方言志吧。正因为如此，我不能不说几句话。

编写方言志是一件极为重要，也极有意义的工作。它描写并保存了某一地区的某一时期语言的具体面貌。这不仅为研究古音，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资料，而且也能为推行当前的语言政策服务。比如我们可以依据方言志所提供的语言资料，编写学话手册，从而更好地推广普通话。

近几十年来，学者们是很重视方言研究的。一九四〇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云南方言就曾做过大规模的调查，其成果反映在一些专家的学术著作中。如已故的著名语言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先生，就曾根据那一次对玉溪方言调查的结果，在他的《汉语方言》一书中专门写了《玉溪方言》一节。这是我们现在编写方言志的重要参考资料。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我省教育厅曾组织了方言调查队，对全省近百个县的方言进行了普查，我也曾参与工作。近两年来，为了编绘方言地图，省语言学会曾派少数组会员（云大、师大、民院的教师）对原来没有调查过的县进行了补查，对一些原来调查过的县又进行了复查。这些

工作，为各地区编写方言志、研究语言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为了进一步弄清全省的方言面貌，使全省普通话的推广和语言教学、语言研究等工作建立在更科学、更牢靠的基础上，也为了配合地方志的编写，省语言学会于今年八月召集部分会员在云南民族学院开会，讨论方言的调查和方言志的编写。我曾在这个会上作了一番鼓动。令人高兴的是，仅仅四个月，张茀同志编写的《玉溪方言志》厚厚的一册手稿已经摆在我的书案上了。作者这种只争朝夕的干劲，不能不令人敬佩。

当然《玉溪方言志》能够较快较好地成书，与玉溪市的党委和政府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市委和市政府切实加强领导，把编写方言志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并由一位副市长亲自过问这项工作，确实是十分可贵的。玉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也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方言志属于描写性型的科学论著，它的任务首先是准确地描写方言的面貌，从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对方言进行描绘。可是，在这之前的地方志或对方言的调查、搜集、整理、归纳，大多侧重语音，即描绘了方言的一个方面，这显然是不够的。而《玉溪方言志》却能从语音、词汇、语法、谚语等各个侧面来描绘玉溪方言，这就展现了玉溪方言的全貌。我以为，其路子是对的，方法是科学的，描写也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应该肯定它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著述。

《玉溪方言志》的资料比较丰富，尤其是词汇和谚语两个部分，比过去见到的方言志要丰富得多。这也是它的优点。

《玉溪方言志》还利用了罗常培先生和吴积才等同志的成果，而且作了比较研究。尽管这本书的某些观点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能既尊重前辈，又不迷信前辈，敢于从实际材料研究中提出自己的见解，不人云亦云，这种态度是值得提倡的。只有这样，才能活跃学术空气，才能推动学术研究的前进。

当然，这部著作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词汇部分还缺考释，语法的描述还比较粗糙。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

尽管有不足之处，我还是要向我们省的语言学会会员，向研究方言的同志们，向从事地方志工作的同志们，向广大的读者，推荐《玉溪方言志》。它是我们学会研究方言的第一部著作，是学会的成果，它的优点和缺点都可以作为我们今后编写方言志的借鉴。

在旧的地方志中，方言志虽也列为条目，但真正修成专志的却不多。这可能是用我国古代语言学那一套方法全面描写方言的具体面貌困难较大吧。描写方言，就得以口语为主，这也许不登大雅之堂，从事这一工作的人是寥寥可数的。今天，我们有了一批专门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还有不少同志对此颇感兴趣，而且语言学的发展又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科学方法，地方志中如果再缺少方言志的话，那就太令人遗憾了。而玉溪市志编纂委员会却能积极

主动组织和配合语言工作者编写方言志，並且很快刊印成书，弥补地方志的缺陷，这实在是值得称道的。

我相信，在《玉溪方言志》刊行的推动下，全省将会有大批方言志问世，我省的语言研究工作也必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程家枢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于云南民族学院

目 录

序

程家枢

概 说

一、玉溪汉人的来源

和方言的形成 (1)

二、玉溪方言概况 (6)

三、玉溪方言研究的历史 (9)

四、玉溪方言的现状 (16)

五、玉溪方言发展方向的预测 (18)

六、编写体例和所用的符号 (19)

玉溪音系

声母 (21)

韵母 (24)

声调 (28)

声、韵、调配合表 (29)

常用同音字表 (48)

儿化 (91)

音变 (96)

词汇汇编

词 汇 (101)

语 法 (225)

谣 谚

歌 谣 (233)

谚 语 (246)

一、有关政治生活的谚语 (246)

二、有关气象的谚语 (247)

三、有关水利的谚语 (253)

四、有关农业生产的谚语 (255)

五、有关家庭生活的谚语 (273)

六、有关人情世故的谚语 (28)

七、其它谚语 (296)

歇后语 (311)

后 记

李文彦

概 说

编写方言志是一种描写性的科学的研究工作，目的是要从语音、词汇、句子、谚语等各个侧面来力求全面地描述方言的面貌，为方言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提供翔实可信的材料，为实现语言的现代化和规范化提供依据。

同时，方言志也是地方志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通过语言这一侧面，不仅使当时当地的语言按其历史的真实面貌保存下来，而且通过它所搜集的词汇、谣谚等为地方志提供研究经济、政治、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线索和旁证资料。

我国的方言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汉代杨雄的《方言》就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方言词典。晋代郭璞称赞它“可不出户庭而坐照四表，不劳畴咨而物来能名。考九服之逸言，标六代之绝语。类离词之指韵，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风谣而区分曲通，万殊而不杂，真洽见之奇书，不刊之硕记也。”这部书到现在也还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我国学者历来重视地方志的研究，但遗憾的是，作为“一方之全书”（章学成语）的地方志，虽然都把方言列为条目，但修成专志的并不很多。这固然和历代编写地方志的目的主要是为“观政”有一定关系，也和我国古代语言研究还没有完全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有关。近年来，我

国语言学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有了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描写方法，记述和描写方言面貌已经是能做到的了。因此，在全国积极开展编写新的地方志的时候，一批用新的科学方法编著的方言志也就应运而生了。例如行动较快的山西省，就已经出版了一批方言志。云南省也正在积极开展新志的编修工作，编著方言志也就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了。

云南省语言学会于一九八四年八月召集部分会员在云南民族学院开会，发动会员编写方言志和方言词语汇编。玉溪地区方志办公室，玉溪师专领导同志都积极支持进行玉溪地区各县方言志的编著工作。玉溪市志办公室对编写玉溪方言志极为重视，办公室的同志都积极参与方言资料的收集工作。特别是市志办主编李文彦同志，不仅亲自主持资料收集工作，还将他自己多年来收集的谚语、歇后语两千多条整理出来，提供给我们选用。本志中谣谚部分中的农业生产谚语，绝大部分是李文彦同志提供的资料。其它部分也用了很多，他们的辛勤劳动，应当记入这部志书。

玉溪市志办公室已经刊印了五集资料，其中梁耀武同志编纂的《历史大事记长编》，使我在编写方言志时省去了许多查阅资料的工夫，尤其是辑录了罗常培先生一九四九年写的《玉溪方言》一文，给我提供了比较的好资料，这是尤其应该感谢的。我在后面引用该书资料时，简称《长编》。

虽然，玉溪市志办公室已经为我编写玉溪方言志创造

了很好的条件，但是，由于我自己的学术水平不高，在描述和编写中一定会有许多谬误，希望读到本志的前辈、同行和同志们不吝赐教，以便将来进一步匡正。

一、玉溪汉人的来源和方言的形成

玉溪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有汉人定居，史无明确记载。有关系的记载可以推到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文中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沃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史记》中华书局版，二九九三页）。这就是著名的庄蹻开滇说。引文中“（地）方三百”的括号中的“地”字，《史记索隐》注为“滇池方三百里。”方国瑜《云南地方史讲义》直接引为“池方三百里”（第三九页）。池旁“数千里”的肥沃平地，（方国瑜认为是数十里之误，未免过小，存疑）。应当包括位居滇中，离滇池不远的玉溪在内。因此，玉溪汉人最早祖先的第一个可能是楚人。

据方国瑜先生推测，这一批战士近两万人，全部是男子，留居滇池，就与当地居民混血，“对滇池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讲义》第四十页），马曜主编的《云南简史》认为，庄蹻开滇是“滇文化”的源

头。玉溪1983年曾发现一把青铜锄，经鉴定，属于“滇文化”型。因此，推测庄蹻的战士有在玉溪落籍的是有可能的。

滇池地区直接和中央政权建立臣属关系是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漫（《索隐》作寢），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史记》二九九八页）这是第二次汉人入滇的记载，这些战士明确说是“巴蜀兵”，而未记载是否留下。但既设郡县，就要派官，也就要留兵，这也当是可以推测的。而且确有“发京师罪人”实滇的记载。当时玉溪属俞元县地，是否有兵，没有确凿记载，尚不能妄测。

汉人进入玉溪的可靠记载是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梁王翼军屯迁入玉溪，屯军主要是汉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汉族军士进入玉溪。屯田三千七百八十九双。元代澂江府军民屯田四千一百双，可见玉溪当时屯田之数不少。其屯田分布地区，以今高仓，李旗至北城一带为主。”（《长编》上，四十一页）。这支屯军约七百人，原籍何地则缺考。

马可波罗游历云南时，滇池区域还以贝为主要货币。任中宜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修的《新兴州志》载：“（新兴）交易昔多用贝，名曰蚆。……明嘉靖、隆庆间两经鼓铸、彝俗格不能行。天启六年因科臣潘士闻建言巡府闵洪学力行之，钱法始通。”以贝为货币，直到清顺治

四年（公元1647年）才完全废除。

另外，康熙《新兴州志·古迹》载：昌人城（今高仓）、禄匪城（今西古城），普具笼城（今东古城），中古城（今中卫）等地，均为梁王重修驻兵。推断“必是屯田据点。”

钱法的难行和屯田尚须筑城自守这两个情况告诉我们，元初玉溪的外来汉人（假定原来有一些土著汉人，即庄蹕之后）数量是很少的，玉溪的主要居民仍是彝族和其它少数民族。

汉族人口在玉溪由少数而变为多数是在明代一代形成的。这主要是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实行屯垦的卫所制度和大量移民实边的政策带来的结果。据明太祖实录，明初“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人数约三百万，主要是江西、湖广和南京人。玉溪究竟有多少大姓移来，无确凿记载，但有移民这一点却是肯定的。玉溪县的第一个进士陈表的祖先就是从湖北来的移民。李鸿祥的祖先也是明初由江南迁来，今之王鸣喜村，就是以他家在玉溪的第一代始祖命名的，可见不在少数。（详见《长编·上》第五十三页）。

明初，在玉溪屯田的军户共五卫，左卫十二伍，中卫二十伍，前卫十三伍，后卫十八伍，广南卫三十一伍，每伍五户，共四百七十户，这是有名有姓载于《任志》的。玉溪坝子里的村名多营、卫、屯、所字样，当是屯垦的语言证据。

这两部分人的子孙繁衍，使汉族人口经过明代一代而跃居首位。陈表中进士和玉溪青花瓷窑旧址的发现都说明

玉溪汉族人口已占优势。全省皆然，不仅新兴一地。

比较麻烦的问题是，这些屯军的原籍却没有可靠的记载，而玉溪方言的形成和这些屯军的关系又至为密切，因此，今天的玉溪话的源头的考查也还难于进行，只能初步推断是土著汉人（庄蹕的子孙和汉代移民的后裔）和明初移民的结合，加上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影响而形成了今天的玉溪音系。但究竟源头是何处方言，当待进一步考察，时间估计应在明初，不可能更早。至于清代以后到玉溪落籍的汉人，虽然籍贯复杂，各地皆有，但估计当时玉溪方言已经自成系统，影响不会太大了。

二、玉溪方言概况

玉溪方言当以州城及其附近的语音为代表。其突出的特点是声母中喉塞音 [ʔ] [ʔ'] 、 [h] 和普通话的舌面后音 [K] [K'] [χ] 形成规律的对应。韵母中不圆唇的单元音 [Oc] 和普通话的单元音 [ɔ] 形成规律的对应。在玉溪现在的十个区中，有九个区都是和州城音系大体相同，只有研和一区差别较大。这是因为历史上研和是一个州辖县，明初撤县并入新兴州，至清初尚设土州判一员“管辖四山彝寨。”（《长编·上》八十一页）可见当时研和的居民中彝族还占相当大的比例，不过已经居于“四山”了，坝子里主要是汉人了，所以研和语音和州城语音的差异主要应是受彝语的影响。

我们调查过研和的音系，它和州城音系的主要差异

是：韵母中 [ə] [ɔ] 分韵。州城话中 [t] [t'] [n] [l] [tʃ] [tʃ'] [ʃ] [ʒ] [ts'] [ts''] [s] 诸声母的 [ɔ] 韵字，在研和话中念 [ə] 韵，如遮车奢，州城读 [tʃɔ⁴⁴] [ts'ɔ⁴⁴] [ʃɔ⁴⁴]，研和读 [tʃə⁴⁴] [t,ʃə⁴⁴] [ʃə⁴⁴]，比州城话还接近普通话。另外，研和话中有一部分 [ɔŋ] 韵字读如 [ãŋ] 韵，如“动象棋”，研和话读如“荡相棋”。另外，词汇的读法上也有一些差异，如“我家”，州城说“娃家” [WA⁴⁴təie⁴⁴]，研和说“歪家” [WAe⁴⁴tə - ie⁴⁴]，州城说“绳子” [ʃuãn³¹ts] 51.44 研和说“索子” [so³¹ts₁] 51.44。有些量词说法也不同。州城说“一条牛”，条读 [t'ia⁹¹]，研和读做 [t'io⁹¹] 等等。但突出的特点：喉塞音和舌根音对应——却是一致的，整个音系无大差异，因此仍应归入玉溪方言，算一个小区。

另外是玉溪北城附近的大营村，是玉溪回族聚居区，都说汉话，但完全没有玉溪方言的上述两个特点，接近昆明话，基本上应属昆明方言。仅 [Ae] 音的开口度较昆明为大，[ən] [əŋ] 两韵分别清楚，多平声字，如说“那点儿”为 [nA⁴⁴tiə⁹¹]。不能算在玉溪方言里。传说是元代云南最高行政长官赛典赤的子女的后裔（《长编上》五四页）。

北城一带元代虽属普舍县，但与州城坝子相连，音系相同、语音无大差别。

玉溪东面临近江川的大小矣资两村是彝汉杂居村寨，

因接近江川，受江川方言影响大，划入江川方言区。（附：方言分布状况图。）

至于州城和附近农村的语音和词汇，也还有一些微小的差别。如州城人笑葫芦园的人把一块钱的 [ʔ[‘]Ae⁵¹] 说成 [hAe⁵¹]，就说明州城人对送气的喉塞音 [ʔ[‘]] 和喉擦音 [h] 是分得很清楚的，葫芦园的人则分不太清楚，这种细微的差别，要很留心才能分辨。在方言分布图上，我们就不再区别了。

三、玉溪方言研究的历史

对玉溪方言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研究，民国以前未见记载。《澂江府志》、《新兴州志》也没有方言研究的记录。

有记载的第一次科学的、系统的方言调查是在1940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罗常培先生1949年发表的《汉语方言》中曾记述了这次调查的情况：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对云南方言——引者注）作大规模之系统调查，除记音外，尚灌制音档甚多，惟结果尚未发表。然已知该次所调查单位计有……玉溪（杯湖村、新民村、朱帽营）……。”罗先生在他的《汉语方言》中还专门写了《玉溪方言》一节，这是我们现在见到的系统的研究玉溪方言的第一篇论著，是研究玉溪方言的珍贵资料。（上面的引文及罗文均见《长编·中》一九八页）

对玉溪方言的第二次有组织的调查是在一九五八年由云南省教育厅方言普查队进行的。调查结果尚未来得及进行整理和研究，资料便在十年浩劫中损失了大部分。1981年，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吴积才副教授和颜晓云同志根据残存资料整理出《云南方言声韵调表》，其中有玉溪方言的声韵调资料。（这份材料后来不知是否正式刊印，我手边的是云南省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发的油印本）

第三次调查由玉溪师专和玉溪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